

“信仰之河”这样奔流不息

央视日前开播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我们的故事》，以党的90多年历程为背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讲述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故事。一个个令人心潮澎湃的信仰故事，传递出让人震撼的信仰力量。

信仰是精神的，却非虚幻的，是通过一个人物诠释的。信仰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实践与坚守。没有实践，信仰会沦为思想的“空中楼阁”；没有坚守，信仰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中国共产党用将近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通过对一个又一个具体鲜活的目标的实践，让信仰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口头上的声音，而是成为一条绵延至今的长河，流过峥嵘岁月，见证历史沧桑，融入时代精神。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在那个“革命和写诗都到了不要命的境界”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放弃了荣华富贵、锦绣前程，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表现出来的坚忍与力量让世界惊叹。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的生命也只有一次，为什么选择“以命相搏”？因为他们有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甘愿用生命去实践，去坚守这份信仰，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良知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他们用这信仰指导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成就了一个“可爱的中国”。

硝烟散去，“战争”却远没有结束。面对“一穷二白”的新世界，信仰面临的挑战虽不是生与死的抉择，却是成与败的考验。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可敬、可爱、可亲，他们用实际行动为信仰注入了新鲜活力。从“抗美援朝精神”到“大庆精神”，从“雷锋精神”到“红旗渠精神”，他们把自强不息、艰苦创业融入了信仰；从张秉贵到焦裕禄，从钱学森到邓稼先，他们把信仰化为了“一团火”“一滴水”，造福社会，温暖人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中不断丰富与完善。让人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信仰的本质。不论是像沈浩那样致力于建设一个新农村，还是像蒋筑英那样致力于改革创新一项技术，或者只是像徐虎一样修好水电，像王顺友一样送好邮件；更不必说在抗击“洪水”“非典”“地震”等危难关头，共产党员所展现出来的勇往直前、不怕牺牲。他们吹响的是信仰的嘹亮号角，展现的是永葆先进、纯洁和优秀的历史画卷。

岁月无声，历史有情。在“信仰之河”里，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一叶扁舟”成长为“一艘巨舰”，中国人民从受压迫受剥削到当家做主。而那些为了信仰“勇往直前、断头流血、殒精竭虑”的过往，依然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路。

安传香

距离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最后期限只剩7天，目前只有18个城市宣布与住建部联网，住房信息联网工程完成率仅45%。住房信息联网可能牵出公职人员腐败问题，一位上市房企营销总监称，大城市的住房信息都已入库，区别在于政府是否愿意公开而已。(6月25日《东方早报》)

住房信息联网数据很敏感？

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其好处多多：这些城市楼市销量、资金流向、房屋空置率等相关信息就会“一览无余”；个人在不同城市间的购房信息将被“一网打尽”，异地炒房不会“漏网”……

如此利好的政策，各城市理当热切响应。但蹊跷的是，住建部在推行这项政策时阻力重重，眼见距离规定的最后期限没几天时间了，仍有22个城市未能按规定实现联网。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个中缘由：个人住房信息联网“数据很敏感”，可能牵出公职人员的腐败问题。

原来如此！虽然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本义不是反腐，却会让个人在不同城市的购房信息“一览无余”。这种“透明”对寻常百姓而言，少有人计较；但对个别腐败者而言，绝非好消息。一位官员若是拥有数套甚至十几套住房，这本身就是一封举报信，借此倒查腐败者，就轻松容易多了。

有些官员动辄拥有N套房子，这早已不是秘密。前不久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就声称：“有权有钱部门的人员有四五套房子很普遍。”一些腐败者动辄被曝光有十几套甚至数十套房子，更是一种印证。

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联网，不仅可为房地产调控提供最基础的数据支持，而且还能“擒贼打兔子”，顺便揪出一些腐败者，这是意想不到的好事。但有悖公理逻辑的是，一些城市恰恰由于担心牵出公职人员腐败问题而不愿联网，究其原因无非有这几种答案：一是个人本身或许不干不净，担心个人住房信息联网“伤及”自己；二是有些人本身是既得利益群体之一，“官官相护”是其惯有的思维；三是有些人反腐“叶公好龙”，嘴上喜欢说“反腐”，实际上只说不做。

为了打消一些城市的“信息安全”顾虑，“鼓动”他们尽快联网，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曾郑重承诺：“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所以，市委书记、市长尽管放心。”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从侧面说明，反腐之路任重道远。

笑谈中

稳增长 香港商业环境可资借鉴

在香港，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白手起家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的费用并出示身份证，新生意最快6天后就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因为除16.5%的利得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种。不擅应酬在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商业环境，对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在经济困难时期尤其如此。要想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扭转经济困难局面，除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度宽松以外，更加重要的，是要给市场经济的所有细胞创造一个宽松的商业环境。在创造宽松商业环境的过程中，政府是主角，因为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决定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香港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这里有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香港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与其长期奉行的政府“积极不干预”政策关系很大。这种政策，从具体事件中可窥一斑：企业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香港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商业环境很单纯，“还不用请吃饭”；有一个放架子鼓励企业百姓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香港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

如果要谈“干预”的话，那就是在经济最困难时期，香港政府会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度过危机。

这些使笔者想起在加拿大做生意的表弟，我曾问他在加拿大做生意的最大感受是什么？他的答案是：简单、自由——除了定期交税以外，加拿大没有任何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和机构经常“骚扰”，创业的初始成本非常低。

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全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力图实现稳增长。我们已经看到，货币政策有了微调，财税政策也正在加力发力。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给创业者创造一个成本低、效率高、廉洁透明的宽松商业环境上做足文章。

中国大陆经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能说与商业环境一点关系没有。从审批部门庞大、税费项目繁多、“三公”经费居高不下、公司企业公关招待费年年增加等，就足以看出商业环境状况。最近，某地宣布开发风能太阳能需要气

象部门审批，可以说是大陆商业环境不容乐观的典型写照。这一新规不但背离鼓励新能源开发政策，而且与新36条背道而驰，归根结底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

香港既是中国特区，又是中国的窗口，更是中国大陆学习吸收先进管理经验和最佳样板。香港仅次于新加坡，世界排名第二的商业环境，对于中国大陆正在全力进行的稳增长，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在稳增长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大力度净化商业环境，大幅度降低创业门槛。具体来说，一是大幅度降低税费，实实在在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二是创业零门槛，对于投资兴办小微企业零费用注册，取消一切收费，三年内免除所有征税，并给予一定额度的小额创业贴息贷款；三是大幅度精简压缩市场直接管理机构和人员，现有审批事项减少三分之一，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限期完结并不收取任何审批费用。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取消审批事项，因为，只要审批权在，就能造成明里不收费、暗地里收黑金的寻租腐败等现象，这同样会加重企业负担。

借鉴香港经验，构建良好的商业环境，既是稳增长的迫切需求，又是中国大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余丰慧

“领导亲戚”可给“折扣”？

据报道，深圳一李姓女子自称找了“政府的关系”，从开发商手中拿得批条，可以7.8折购买两套别墅，低于市场价839万元。不过事后，开发商不同意按折扣价卖房，女子指其不讲信用尔反尔。开发商则说：“她说她是某书记的亲戚，我才给她这个折扣。如果她不是，我会给她这个折扣？”



说穿了，这800多万“折扣费”，完全是一宗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而已。凡是涉及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都是对当今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的一大威胁，有关方面不可不予警惕。吴之如 文/画

1元以下免征触动民众减税神经

近日，国税总局发布《关于1元以下应纳税额和滞纳金处理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表示为提高征收效率，降低征收成本和纳税人负担，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缴税凭证上的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为1元以下的，归零计算。

公告一出，即引起网民热议。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小型微型企业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等方式降税，但民众对继续降税的期待仍然很高。如今再次听到与减税相关的消息，数额却是“1元以下”，难怪一些网民感觉“失望”了。

相比于“降低纳税人负担”，“1元以下免征”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降低征收成本。2011年全国完成税收8.6万亿(扣除出口退税)，小数点后资金冗余是一笔不少的数目。但与此相比，计算机系

统更新、核算人员增加、票据、纸张等成本会大于所收款项。一句话，征收“1元以下应纳税额和滞纳金”，不划算，干脆不征了。

其实，作为税务部门，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率本身就意味着税款的利用率提升，而这也是对纳税人最大的负责，不必再说这是为纳税人减负，如果这种获利对个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话。

虽然站在税务部门立场，从汇总的数据来看，可以认为确实是在试图降低纳税人负担，否则仿效欧美国家实行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制亦无不妥；但看起来可观的整体数据，细分到个体都会显得渺小。站在普通纳税人角度，无论是进位制、归零制抑或四舍五入都几乎不会对公众产生太大影响。尤其是从感性上讲，如果“1元以下”的负担降低，是需要

背负“被减轻”的标签，大部分人都会不屑一顾。

这些年来，一有和“降税”有关的信息，无论大小，均曾引发民众热议。而加强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民众负担的呼声，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也显得越加必要。“降税”对中低收入者而言，就是“增收”，就能提升消费意愿，从而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现在，从有关部门“1元以下免征”的新政，不难看出阳光的一面：以提高税款利用率为出发点，减少高成本税收行为(如小额纳税)，也是一个有前景的出路。如果这是税务部门从注重直接效果到间接效果的转变，从更综合的角度调整税收结构，那么，降低高值消费品税收以缓解境外购物热，提供普通公众消费退税等，都是可以期待的大好政策。

京文

只许银行钻空不许客户捡漏？

2000多万在眼前，莫名其妙就被划走了，这种感觉肯定不好受。一个名叫宋荣贵的人就经受了这样的折磨。2006年，宋荣贵利用中国工商银行提供的黄金买卖交易系统，10天内买卖黄金2100千克，获利2100多万元。其后这笔钱被济南冻源工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划走。宋荣贵将银行告上法庭，日前，山东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支持银行行为。(6月26日《齐鲁晚报》)

从公布的信息来看，宋荣贵确实捡了银行的漏。正如法院审理认为，“银行交易系统应当作出拒绝接受交易的判断”。可由于该系统存在漏洞，不能够作出正确判定，造成了宋荣贵的交易没有被系统发现。银行把这笔钱当做“不当得利”划走，法院也支持银行的行为，都表明他们不认可这种“捡漏”行为。

虽然在民间语境中，“捡漏”、“钻空”多少带有一点贬义。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目前富起来的人中，多数人其实是钻的法律或者制度的空子。从银行来看，民间一直诟病银行利

么行为呢？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见到银行把过去“钻空子”得来的利吐出来。客户“捡漏子”是“不当得利”，自己“钻空子”是经营有方，银行的这一双重人格只能让人不齿。

按照银行“钻空子”的习惯做法，发现空当了，那就把空堵上，下不为例。同样，发现客户“捡漏”了，也只有把漏补上。至于说客户通过“捡漏”获利了，那也只能怪自己管理不善。

从个人感情上讲，我们并不支持“捡漏”行为。但市场经济恐怕也无法避免“捡漏”、“钻空子”。网上流行一句调侃语：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真正的理性之举是走好自己路，让别人无漏可捡，无空可钻。从人格统一出发，银行还是先把自己“钻空子”得的利吐出来，然后再把客户“捡漏”称为“不当得利”吧。

毛建国

“当今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一个卓越的学生来？”面对这一在校大学生提出的问题，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很淡定地回答：我相信你们这一代会出更多的人才，更多的大师，我绝对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师来！他希望大学生要学会怎么学习，怎么吸纳全世界各种知识的积淀，在此基础上去摸索创新，以后就会成为大师。(6月26日《中国青年报》)

“不相信”之说 回应不了“钱学森之问”

这是欧阳自远用另一种方式回答“钱学森之问”，他多了些乐观精神，但显然少了些钱学森式的忧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创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是，在现行办学体制下，难以培养出大师。而“不相信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则是表达一种愿望，与“钱学森之问”是两个概念。自欺总是不好的，也是难以服人的。长期培养不出大师，说明教育制度设计有问题，与其在那里淡定，在那里乐观，在那里指山卖磨，不如找出问题症结所在。

大师是什么？大师是那些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的人，是开一代文化风气之先的人。一般专家、学者、教授、诗人，皆不能称大师，只有那些专家中的专家、学者中的学者、教授中的教授，诗人中的诗人，才配称得上大师。大师是师表，是楷模。大师是创造，是光华。

大学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培养大师的所在。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关。大学所训练出来的人也有特殊机能，但只有特殊机能还远远不够。所谓特殊机能就是“器”，如茶杯可以盛水，凳子可以坐。人如果只有机能，他就只是一个“器”，甚至可以是一个“大器”，但无论如何总是一个“器”。而大师则是合乎理想的人，是独立的人格，有的思想足以影响一个时代，有的培育的学术气氛可以形成一种人文标志。

培养大师，需要环境，需要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主。只有在自由的学术环境里，才可以培养出大师。什么样的学术环境才算得上自由的学术环境？冯友兰先生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现在世界的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精细。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不研究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一所大学也可说是独立的、“自行继续”的团体。所谓“自行”，就是一个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由自己决定、支配。

从根本上说，“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师”是一种犬儒精神，这种不相信完全没有用。“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师”，亦回应不了“钱学森之问”。与其“不相信我们就培养不出大师”，倒不如去做一切可能的改善，通过某种制度的“顶层设计”，改变不利的办学模式，创造培养杰出人才以至大师的条件。今语

据报道，陕西镇坪猎人周正龙满刑出狱时，面对大批前去采访的媒体，曾坚定表示还要上山找虎。现在，他果然又上山了。24日，记者得到了周正龙在北京《财经》杂志记者陪同下，在山上拍摄的5张照片，照片里有一些大型动物足迹。(6月26日《城市晚报》)

娱乐时代 没有野生虎 一定要有周老虎

从出狱的第一天开始，周正龙就面对媒体口出狂言，表示要继续上山寻虎。而旋即，周正龙再次声称拍到了老虎脚印，仿佛又让人回到了“正龙拍虎”方兴未艾的时候。

周正龙为什么撞破南墙都不悔，答案并不复杂。横空出世的“正龙拍虎”，没有唤醒公共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而是引发了至今还没有完全平息的网络娱乐热潮。以至于周正龙刚出狱，各路媒体就蜂拥而至。舆论的过度关注和追捧，让这个老农窃喜：“周老虎”是具有品牌效应的。因而，舆论对于周正龙的追逐越强烈，“拍虎英雄”就越兴奋——他真的是“要一个说法”吗？我想，他所图的不是“说法”而是“利益”。持续两年多的舆论追捧让一个乡村农民，成长为“有着特殊的斗争策略和强烈地掌控媒体的意识”的农村里的聪明人。

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周正龙再拍虎”已经与公理正义和法律规则无关，演变为赤裸裸的娱乐事件。而相应地，小农民意识的造假者周正龙亦成功“转型”为通过商业炒作和炮制看点来获得名利的网络红人，与“凤姐”之流并无太大的区别。追捧者图的是“围观效应”和“眼球效应”，而“周老虎”图的也就是心照不宣的那点儿事儿。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周正龙已经逐渐被包装成全新的“周老虎”。“周老虎”的“寻虎”式炒作，与芙蓉姐姐的自恋、凤姐的示丑，形不似而神似，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前这个娱乐狂欢的时代，可以没有野生虎但一定会会有“周老虎”，不管其背后有没有炒作的利益链条，都难以否认“周老虎”娱乐偶像化的结果，更不会影响“周老虎”作为中国式炒作的时代印真实记录下来。“周老虎”们属于这个看点消费越演越烈的时代——过去、现在或者是将来，我们都将无法回避中国式炒作在社会转型期所席卷而过的深深阵痛。

陈一舟